

發表在本期杂志上。

圖書館工作人員應該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并應不倦地研究圖書。在任何圖書館里，不管是省、區、市、兒童或工人的圖書館，都應當定期舉行新書評介會，並組織對這些新書的評論。在區和市的業務講習會上，圖書館員應當用更多的时间去熟悉圖書。

如果不認真地研究讀者的興趣和讀者對圖書的需求，要想提高圖書館的思想教育工作，那是很難想像的。我們都記得，列寧格勒市馬雅可夫斯基中心圖書館曾經把一本讀者意見簿呈獻給了第二屆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意見簿上有工人、職員、大學生、專家們提出的兩千條意見和建議。但是，收集意見難道只有在作家代表大會召開時，只有在文學作品方面才是需要的嗎？

調查和研究讀者的興趣，這是圖書館員應負的責任。但是，至今還沒有看到有哪些圖書館員在認真地從事這一工作。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的圖書館學科學方法研究室應當負起指導研究讀者的工作。

按照不同對象有區別地正確地為讀者服務，這也是當前的一個現實問題。

許多圖書館員直到目前還把學生視為第二等的讀者羣衆。這是不對的！要知道，愛好讀書的習慣

正是從幼年和少年時代發展起來的，要求和愛好也是在這一時期逐漸積累和形成的。學生時代所讀的書往往是終生難忘的，給人以特別有力的影響。我認為，在所有的市和區圖書館里，只要借書處有兩個工作人員時，就都應專門成立一個青年讀者借書組。應當專門為青年讀者舉辦展覽會、圖書評介會和座談會。

在對青年的工作中，應當時刻考慮到青年的需要、要求和興趣。例如，有一個學生就自己的需要寫了一段話，這段話寫得很好：

“現在是我學習的年代，積累知識的年代。我希望，在這些年代里不僅給我以生產方面的知識，而且還使我在我們作家的書籍的帮助下更深刻和更好地認識到人的靈魂、我將同他們一道沿着廣闊的生活道路前进的人們的靈魂。”*

向着共產主義目標前進，緊密地結合共產主義建設任務，有系統地幫助讀者選擇和閱讀圖書，這就是蘇聯圖書館的特徵。我們的圖書館員，是幫助黨教育蘇聯人民——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的積極助手。圖書館員的思想力量就在於此。

（金初高譯自蘇聯“圖書館員”，1958年第2期）

* “少年時代”，1957年，第10期，第4頁。

必須消滅圖書館學教育中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

——記北大圖書館學系教學中資產階級教學思想展覽會

王永厚

北大圖書館學系從3月16日開始在民主樓圖書館學教研室舉辦了一個教學中資產階級教學思想的展覽會。通過大字報、講稿、筆記、圖片和說明等不同形式，明顯而生動地反映了圖書館學系在教學上兩條道路的鬥爭。展覽會上所暴露的問題是極其嚴重的。

黨性原則表現在哪里？

黨性原則是我們各項工作的根本指導原則，是各項工作的靈魂。圖書館教學也不能例外，必須認真地、自始至終地貫徹這一原則。北大圖書館學系的每門課程雖然一开始几乎都談了黨性原則，但這

只是當做開場白，拿來裝門面，無非從理論上抽象地、簡單地講一講，很少聯繫實際，因此，所給予學生的感覺是“魂不附體”。二年級的一張大字報上這樣揭露：老師在講黨性原則時不自然，不像自己內心的話，沒有和講稿本身血肉般地融貫起來。講稿中談到黨性原則的地方，不僅內容空泛，而且數量也很少。如“圖書館學引論”共164頁，談黨性原則的只有3頁。

黨性原則篇幅少，內容空泛，因而在講稿和教學中也不能很好地貫徹。如“參考工作與基本參考書”這門課，它的任務是學習如何“解答讀者的疑難與滿足他們的圖書要求”。誰都知道，馬列主義著

作、党和政府的文件在我們社会主义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讀者經常需要這些圖書，圖書館員就應該幫助解決實際問題和滿足羣眾的要求。參考工作應該怎樣運用馬列主義著作、党和政府的文件來向羣眾宣傳呢？在講稿中從頭到尾一概沒有提到。再如“藏書與目錄”講稿中會有這樣一段話：“圖書分類法的編制工作，要求具有文化和業務水平比較高的人來做，而圖書分類法的使用也必須具有專門訓練和具有一定文化和業務水平的人才能使用得好。這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問題”。這裡單單丟掉了政治思想！我們不禁要問：圖書的分編和使用就可以不要政治思想麼？類似這樣只強調技術，強調文化修養而忽略政治思想的觀點在其他講稿中也時常發現。另外，教師在講稿和教學中也缺乏為廣大羣眾服務的觀點。很多地方都過分地強調圖書館怎樣為科學研究服務，並詳盡闡述各種服務的方法，而對如何為廣大羣眾服務這一點却談得很少。

厚古薄今、頌古非今

從展覽中可以看出：北大圖書館學系教學中厚古薄今、頌古非今的現象非常嚴重。一張圖表上表明 13 門業務課中講歷史部分的就佔了 46% 強，而且其中絕大部分是講古代史的。以普通目錄學為例，全部講稿 9 萬多字，但講解放後目錄學發展的只有短短的 15 頁。歷史書籍目錄學長達 6 萬字，奇怪的是：圖書館學系的課竟連圖書館三個字都沒在講稿中出現過，更不用說怎樣為圖書館事業服務了。藝術書籍目錄學更是百分之百的頌古——從上古一直講到晚清小說，而且講得有血有肉，不厭其煩地去推敲考究著者、版本源流，曾經用 5,000 多字去考證白居易的作品總集，而談到現代作品却是輕描淡寫地一笔略過，如對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只說是“現今中國小說史的著作中最好的一個”。至於解放後的藝術書籍，根本只字不談，好像目前連一本值得推薦的優秀藝術作品也沒有。另外，在介紹分類法時，把劉國鈞的“中國圖書分類法”放在第一位，詳細闡述，倍加推崇，而對其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體系則絲毫沒有加以具體分析和批判，便讓同學在實習時使用，因而在無形中受到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影響。但對政治思想性很強的“人大法”却放在最末來講，而且講的也很簡略，沒有指出它的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表現在哪些方面。

重古輕今的現象在講授內容和觀點上更明顯地表現出來。如歷史書籍目錄學對孔子、朱熹和舊史官的“德性”大加欣賞和贊揚，毫不加以批判。把中國史書的發展完全歸功於幾個“天才的史學家”，忘掉了勞動人民在歷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在“中國書史”中雖然談到了現代圖書出版情況，但過於簡略，有時是用錯誤的觀點來講的。如介紹馬列主義傳入中國時，竟說：以康有為的“大同書”為最早，對康及“大同書”無任何批判，使學生對康梁等人產生錯覺，以為他們對傳入馬列主義還有所貢獻。再如馬列主義在“五四”運動前後的傳播，書史本應做出重大估價，詳加論述，但卻只停留在介紹“新青年”等刊物的一般情況上，忽視了馬列主義和“新青年”對革命所起的直接影響和巨大的政治意義。書史中還處處表現詳古略今，對“永樂大典”等古書均詳加介紹，歌頌備至，竟以為是“不可比擬的寶貴的文獻”，而對於黨和毛主席在各個歷史時期所發表的著作却只提一下書名，而不講它們的重大意義和所起的影響。對近幾年來所出版的“普通的書”和“小冊子”不感興趣，却說成是“趕熱門”、“只顧配合運動”。這些事實不是有力地說明要把學生拉進故紙堆中，脫離逃避現實鬥爭麼？

脫離實際

圖書館學是實踐性很強的科學，教學必須密切結合實際。但北大圖書館學系的教學却不是這樣，理論脫離實際的現象是驚人的。按理說圖書館學系的學生應該和圖書館建立密切的聯繫，經常去參觀、實習以增加實際工作能力。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請看大字報的揭露：三年級再有三個月就要畢業了，可是他們還從沒到圖書館實習過一次；一年級入學已經半年多了，連本校圖書館都沒參觀過。而僅有的課堂實習又是那樣脫離實際。如“讀書指導”課堂實習，不讓同學到圖書館去接觸真正的讀者，却要同學坐在教室里假想一個讀者，空想几本書向他推薦，還要給他制訂“讀書計劃”。這怎麼能切合實際呢？展覽會上展出的課堂討論發言提綱和實習報告，都是同學坐在宿舍或教室里東拉西扯湊成的，根本不結合圖書館的實際情況。

理論脫離實際的教學是和教師的思想分不開的。北大圖書館學系 8 名助教中就有 6 名沒做過圖書館實際工作。大多數教師重業務，輕政治；重理

論，輕實踐；重視科學研究，輕視教學；而在業務課上又重視目錄學，輕視圖書館學。系里有这样一种驕氣：似乎圖書館學系培养的学生都是理論工作者，在課堂只能講“圖書館是社会主义文化基地”、“圖書館員是圖書館的靈魂，是教育家”……而很少联系同学的思想情況（有的關專業思想問題）和圖書館的實際情況，相反地，倒向同學灌輸了資產階級思想。有位教師在講課中鼓勵學生“集累而專”、“鍛煉成家”，叫大家隨身常帶卡片，收集資料，日積月累就可名利雙收了。這實質就是宣揚只要本領，可以不关心政治；只要苦干苦鑽、個人奮鬥就可以成家成名。這已給同學帶來很壞的影響，助長了某些同學的名利思想。如有的同學就按着這條道路，隨身常帶卡片，東找西湊，準備著書出版……。這難道不值得教師們深思么？

向誰學習？

在展出的每本講稿中，一开头几乎都提到了向蘇聯學習、黨性原則和思想性等問題，但在後邊的篇章以及實際教學中並沒有貫徹。蘇聯圖書館學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蘇聯的圖書館事業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但在課堂上從未系統介紹過。在“圖書館目錄”課中，說學習蘇聯是“機械地搬運蘇聯先進經驗”，說這是“教條主義”，並要加以“肅清”，更不要說向各人民民主國家學習了。然而奇怪的是，却在專題講授課中專門介紹英、美的圖書館事業。請看講授的都是些什麼呢？在“美國的公共圖書館事業”講稿中一开头就这样說：“美國比起歐洲和亞洲許多國家，缺乏文化上的悠久傳統。……但這並不是說美國就沒有它固有的民族文化了，或者說美國文化中就絲毫沒有可取之處了。美國的民族文化帶著資產階級文化中比較年輕和現代化的一部分的特點；另一方面，由於依靠金錢收買和掠奪，以及其他手

段，從歐洲方面繼承了一部分文化，多年來它已融入美國的文化中，形成它的一部分。”這一段話實際上是宣揚了資產階級“統一的”、“全民族的”文化理論，掩蓋階級鬥爭，並宣揚了現代資產階級文化。而在講解英國圖書館事業時，又對同學灌輸什麼“英人好學”和“英國圖書館員服務態度好、專業思想堅固”等等，並贊揚英國圖書館如何先進，如何機械化，而對其反動本質却沒有很好地加以分析和批判。

去年整風開始不久，右派分子向黨進攻，北大圖書館學系也掀起了一股懷疑學習蘇聯的歪風。在5月26日會上，特地介紹了美、英、法、舊中國圖書館事業以及圖書館教育的情況，毫無批判地報告了歐美和舊中國圖書館和圖書館教育如何完善，制度怎樣合理，館員待遇如何高，而對蘇聯先進的圖書館事業却只字不提。從課堂上的專門講授和這次報告中，使某些同學產生“中不如外”、“今不如昔”的感覺，影響後果是很壞的。二年級同學在大字報上寫道：“不難看出，老師們對資產階級這一套還是留戀的，要培養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圖書館工作者，這些問題真值得老師們考慮。”

教師的話

在展覽會上有這樣一幅顯眼的標語：“有又紅又專的老師，才有又紅又專的學生”，當北大圖書館學系教師們仔細看完了展覽和看到這付標語時，心理是沉重的，一種責任感在激勵著他們。鄧衍林先生看完了展覽，在意見簿上留下了這樣的話：“我在教學中有濃厚的資產階級思想，你們揭發的還不足，火力還不猛，我身上有毒瘤，請同學們開刀，愈痛愈深愈好。”這些天來，他們經常交談心得，漫談如何進一步深入揭發，以便改造思想。